

# 當代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 1989-2009

區龍宇、白瑞雪

中國工人階級在八九民運第一次真正發展了自己的獨立組織。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還不斷提醒學生聯合農爭取民主。工自聯並非後來中共所聲稱的要復辟資本主義。相反，當時工自聯主張保護國有資產，同時從政府驅逐官僚腐敗份子。

只有徹底鎮壓八九民運和工運，然後中共才能在1990年代末進行私有化。但各地工人還是出現各種反私有化鬥爭，雖然難以扭轉大局，但時而取得局部勝利。另一方面，在世紀之交，新一代民工也開始登上勞工抗爭的歷史舞台。



勞工世界網

## 當代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 1989-2009

區龍宇、白瑞雪

勞工世界網出版

2010年6月4日

第一版

網址：<http://www.worldlabour.org/chi/>

電郵：[info@worldlabour.org](mailto:info@worldlabour.org)

版權所有

非商業轉載請列明出處

## 目錄

從「主人翁」到打工仔 .....	2
1989年民主運動 .....	4
工人階級參與 1989年民主運動 .....	6
反私有化的抗爭 .....	19
把官方工會改造為工人工會： 2000年鄭州造紙廠工人的抗爭 .....	23
跨廠聯合：遼陽鐵合金廠工人抗爭 .....	28
獨立組織：大慶油田抗爭 .....	33
社會主義思想不死： 2004年重慶3403工廠工人抗爭 .....	37
國企工人瘦身，潛力依然強大 .....	45
農民工的反抗 .....	47
結語 .....	51

# 當代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 1989-2009<sup>1</sup>

區龍宇、白瑞雪<sup>2</sup>

當代中國一直都有重要的工人反抗行動，但是在一黨專政下，無法出現持久的自主組織，所以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工人運動，即自下而上、有組織性的持久行動，去爭取國民收入再分配，直至分享國家權力。1989年是工人鬥爭的分水嶺，因為第一次出現真正獨立於中共及其最高領袖的工人自主組織，反對中共腐化和把國家財產據為己有。文革時期雖然有工人發起的組織，但並非真正獨立於中共。但是1989年的工人自主萌芽很快被中共徹底消滅。只有徹底打敗國企工人的反抗，然後中共才能隨心所欲進行私有化。工人階級此時已經無力扭轉私有化大局。但是，各地還是出現各種反私有化鬥爭並時而取得局部勝利。

---

<sup>1</sup> 這篇文章，原文英文，是為2010年第二版的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Revolution and Protest 1500 to the present* 所寫。該書由 Immanuel Ness 編輯。這個中文版字數稍多於英文版。

<sup>2</sup> 兩位作者是勞工世界網編輯。這個中文版也得到李芬先生的幫忙蒐集資料，特此致謝。

同時，在世紀之交，新一代民工也開始登上勞工抗爭的歷史舞台。

這篇文章為大家介紹過去 20 年，工人階級中舊的和新的兩個部份的抗爭特點，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 從「主人翁」到打工仔

在毛澤東時期（1949-1976），中國也出現過自發的工人抗爭，但其規模和意義大不同於鄧小平和鄧後時期（1979-2009）。

在毛時期，尤其是 1956 年後，工人尊稱為「主人翁」和「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共產黨視他們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化身。在文革前後，工人更是抵抗「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依靠對象。然而，實際上工人的狀況與其尊稱並不相稱，他們跟農民一樣，並未真正享有基本的政治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結社、罷工、遊行等）。雖然有民主選舉的形式，但是實際上，從選舉企業管理層、工會領袖直至選舉國家領導人，統統都是有名無實。在日常生活裡，「主人翁」這尊稱對工人無甚意義，他們每天都要聽從所謂公僕（幹部）的命令。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只是國家機器的一部

份，既非由工人自由選舉產生，亦非向工人負責。另外，按照法律，「職工代表大會」（與德國職工代表會議相似），享有監督管理層的權力，也參與決定工資和工人福利，甚至是選舉經理。可是，中國不像德國那樣，職工代表會議同工會系統分開，相反，而是由企業工會擔任職工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這就保證了共產黨能始終控制後者，使它只是像全總一樣的政治花瓶，而非真正的工人組織。而且，上述兩個組織均自 1957 年起被邊緣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停止運作，二十幾年後才形式上恢復。

不過，工人在經濟地位上，還是比農民優越。至於地主和資產階級，最晚到 1956 年就先後被列為剝削階級而不容存在了。至於企業幹部，當然比較工人享有更多經濟收入和物質特權（如果拿普通工人同省及中央級官員比就相差更遠），但是與鄧小平時期相比，工人與幹部之間的經濟不平等還是有限的。當時工人的確享有就業權、社會保障和較高的生活水平。「領導階級」的尊稱也使他們擁有相對優越的社會地位（例如，在政治運動中所受傷害最小；在婚姻中工人身份可獲明顯的優勢）。這些待遇是他們在國民黨政權下想也沒有想過的。雖然中國工人不論在企業或國家層面上都沒有真正權力，所以在政治上存在非常嚴重的不平等，但他們享有工作保障，不會輕易被裁，這對企業幹部權力多少是一種制衡。工人充分意識到，他們

是以血汗創造了國家大多數的工業財富，所以他們對工廠有強烈的歸屬感，並嚴肅看待自己所分配的一份是否公平。所以，在毛澤東時期，工人階級對現狀的不滿比較鄧時代要低，因此很少出現獨立於中共的巨大的工人抗爭。在建國初期和文革時期，出現過罷工潮，但通常都是小規模的經濟罷工，即使偶然升級為政治行動，為時都極短，而且難以獨立於中共最高領導。

相較之下，在後毛澤東時期，由於中共進行資本主義復辟，國企工人感到被出賣，自身的經濟利益亦受侵蝕，於是不滿開始上升。同時，各級官吏投機倒把，更使不滿蔓延，終於引發學生在 1989 年起來抗議。在最高潮時，大量工人參與民主運動，並且首次出現工人自治組織。

## 1989 年民主運動

鄧小平在 1979 年上台是工人命運的轉捩點。自此以後，市場改革以犧牲工人和普羅大眾來換取官僚和私人商業的崛起。這時期也是鄧小平開始將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由爭取工農的默認支持，轉移至新興資本家。這種改變的明顯證據是，一方面，1982 年中共廢除憲法上的罷工權，另一方面，又逐步修改憲法

來保障私人企業及他們的私有財產。1987 年他向非洲代表團表示「不要搞社會主義，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sup>3</sup>。總之到那時為止，中共的階級政策，已經從壓抑資本，扶持集體和國企工人，改為扶持資本，打擊工人，而這個政策的總和結果，就是恢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點，可以從鄧小平力主中國向香港學習，但意思是只學香港的營商技巧，而非學習其尊重公民自由，而可見一斑。所謂改革開放，其種種具體措施客觀上都是配合上述總方針。對於企業經營不善的責任，中共不是追究一直擔任管理的幹部，而是推給被管理的工人。所以中共的企業改革，重點就是獎賞前者，下放經營全權給經理，同時打擊工人，包括加強勞動強度、拉大收入差距、引入合同勞動制度、降低工資等。這引起了工人不滿。一位在 1989 民運中擔當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的委員說：

因為改革開放，大部份企業實行了承包制。…這幾年的工資政策、工資調整中，因為工人不可以拿獎金，就使他們在工資、福利方面原本跟幹部產不多的保障受到了損害。就是說，幹部在生活福利、醫療方面還是有保障的，而工人除了副食品補貼之外，其他的就跟幹部、知識份子有一定差距。…這就造成不少工人收入因物價上漲而在生活上入不敷出的現象；加

---

<sup>3</sup> 前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在接受明報記者的長篇訪問時透露此消息。見 2008 年 10 月 14 日明報。

之社會上不正之風盛生，工人的地位在城市就變為最低層。所以，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怨言，是普遍的。這在民運之前的幾年中，已經普遍存在。<sup>4</sup>

同時，八十年代後期的物價改革所曝露出來的官僚腐敗，引起的群眾反感更為強烈。物價改革出現了所謂價格雙軌制（工農業生產的物資分為「計劃定價」和「市場定價」），使官員有機會變成「官倒」，就是以較低的「計劃定價」買入供不應求的產品，然後以較高的「市場定價」賣出，賺取差額。同時，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成立不同類型的公司賺錢。總之，這時候官僚階層實際上也變成資本家。另一方面，勞動人民卻要承受通貨膨脹、生活惡化之苦。民眾對此憤恨交加，促使他們在 1989 年積極參與學生發起的反腐敗示威。

## 工人階級參與 1989 年民主運動

北京民主運動不但震動全國而且震驚全世界，除了心情感到極大的壓抑，為死難的戰士和無辜死去的

---

<sup>4</sup>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 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 年，72 頁。

人感到萬分悲痛以外；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掘起…<sup>5</sup>

上述引言，是一位支持民運的全總工會成員在鎮壓後描述的。這是民運的潛在力量的見證。這場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它挑戰了中共政權代表工人階級利益這種說法，實際否定其合法性和權威性。這種挑戰，由於有成千上萬工人參與，而成為可能。

一般人理解這場民運為學生運動，可是工人在運動中期大量參與，在後期發起自治組織，這些重要事件卻經常被忽略。其實，正因為有了這個新發展，才令到中共提高警惕，並決定在 6 月 4 日鎮壓運動。工人運動遭到挫敗，使中國工人階級在往後處於渙散和士氣低沉的狀態，無力在全國反抗中共在 1992 年起全力推動國企私有化的資本主義大躍進。結果是六千萬國有及集體企業工人下崗；另一方面，這次資本主義大躍進也大量吸引中外私人資本投資於血汗工廠，將一億五千萬農民變成廉價勞工。

這場民運是在 1989 年 4 月中旬揭開序幕。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後，北京學生展開反貪腐、反官倒和爭

---

<sup>5</sup>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 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出版，1990 年，110 頁。

取民主的示威。大量工人自發去天安門廣場傾聽學生演說，接著紛紛希望親自表達對學生的支持。一位工人被問及為何投身民運時，他說「學生們反官倒的主張，講出了我們工人的心裡話」<sup>6</sup>。當學生在 4 月 19 日靜坐期間被公安毆打時，很多工人都義憤填膺。

不久，工人參與由學生發起的辯論，在大字報、傳單和公眾演說的推波助瀾下，民運開始注入了工人階級的元素。學生大多只著重爭取公民自由，特別是爭取言論自由、終止貪腐、與政府當局對話和公正評價胡耀邦。但早在 4 月 18 日，工人已向學生發表一封公開信：

你們一定要爭取到廣大工人、農民、士兵和個體戶們的支持，那麼怎能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呢？首先不要只強調知識分子待遇和增加教育經費，不要空洞喊要求民主，因為這會影響同學和工農間的關係，不利於團結。

要向工農兵宣傳所謂『全民所有制』實際上已變成了少數貴族老爺所有制。廣大工人農民創造的財富，少數貴族老爺享受，他們稱我們是『國家主人』，

---

<sup>6</sup> 同上，23 頁。

可是主人幾世同堂，住房擁擠不堪，他們自稱『公僕』，卻到處建別墅。…試問：這同封建君主有什麼兩樣！<sup>7</sup>

當時的知識界普遍忽視工人利益，反而期望「企業家階層」擔當民主旗手，所以鮮有人提出把工人利益納入民主運動的綱領內，及發動工人聯合學生。唯一這樣呼籲的知識分子是任畹町：

八六學潮缺憾在於民主、人權、自由的空泛口號而無具體的行動綱領和長遠的奮鬥目標，沒有代表人民提出反對通貨膨脹、降低物價、提高工資的要求，因而失去了支持，八六學潮應該產生自己的理論總結。

只有當幾千萬產業工人意識到自身民主權利不是靠他人賜與而是靠自己爭取並足以掌握局勢的時候，中國的生產騰飛和民主事業就接近實現了。…

工人兄弟們，合法組織起你們自己的社團吧！學生同工人的聯合萬歲！<sup>8</sup>

---

<sup>7</sup> 《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1989 年 6 月，十月評論，33 頁。

<sup>8</sup>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 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 年，164-165 頁。

4月17日包括劉強（印刷工人）、韓東方（鐵路工人）和賀利利（北京工人大學講師）在內的幾個人，率先自行發起組織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以下簡稱北京工自聯）籌備委員會。他們組織起來，除了為保護學生外，也為了希望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發表公眾演說，譴責攻擊學生的行為和呼籲工人組織起來。他們也到訪工廠和煤礦，向工人宣揚他們的綱領，鼓勵工人加入聯合會。工自聯的訴求包括增加工資、穩定價格和公佈政府官員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工自聯籌委會將組織定位為工人團體，只容許工人加入。當時是工自聯供給組的組長梁洪說：「我們只許工人參加，並查驗身份證和工作證，發給我們自治會的證件以保證自治會的純潔性」。會員更需要付會員費和保證遵守國家的憲法、遵守組織章程和以全體工人階級利益為依歸。換句話說，它是以服務工人階級為目標的守法組織。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民運是一場動亂，這激起了學生和北京市民的民憤，翌日二十萬學生遊行，期間有百萬北京市民向他們夾道鼓掌。5月13日學生決定發起絕食，同時大量工人開始加入抗爭行列。5月15日有六十萬人上街抗議，第二日再有二十萬學生和工人遊行，5月17至19日共計有百萬人遊行支持學生。一隊隊工人攜帶寫上他們工作單位名

稱的橫額遊行。有二百名首都鋼鐵工人遊行，橫額寫上「支持學生」、「為何總理不回應學生？」；東風電視工廠工人的橫額則寫上：「我們不再生產電視機，直至官倒倒下！」其中一名工人在傳媒訪問時指出，他們生產的電視機，被太子黨拿來轉售圖利。其他標語包括「打倒李鵬」、「打倒小平」、「學生在餓，為何你和你的孩子還在吃？」等等。

很多工人都知道全總受黨控制，它也不能代表工人。一位前工自聯成員說，全總唯一的活動就只有派電影票。所以工人決定組織獨立工人團體去捍衛他們的利益。這是自1949年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另一方面，在全民動員要求民主的時候，全總也受到內部成員的巨大壓力，所以也向學生捐款一萬元人民幣。同時，開始有全總幹部參與遊行，表示與學生團結一致。有一封請願信，由「部份全總幹部、部份全總基層幹部和部份工人運動學院的師生」聯署，要求政府：

1. 肯定學生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要真誠與學生和社會各界立刻對話；
2. 切實保障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的監督權和政治參與權；
3. 懲治腐敗、懲治貪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4. 改造官辦工會，實現工會自治、工會立法，工會要為職工群眾說話辦事。<sup>9</sup>

隨著勞動大眾漸趨激進，他們開始提出官僚剝削工人的議題。北京工自聯在 5 月 17 日一封給全國的公開信裡，對工人階級遭受中共官僚剝削提出質疑：

我們認真核實了對工人的剝削帳。剝削方法是按馬克思的《資本論》告訴我們的分析法。我們將全部產值扣掉工人的工資、福利、醫療及必要的社會積累、設備折舊和擴大再生產等費用外，我們吃驚地發現：『人民公僕』們侵吞了人民盡血汗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sup>10</sup>

5 月中另一封由北京工自聯分發的公開信裡，明確指出：

人民才是多數，專制者才是『一小撮』。如果我們工人站起來，向前走出一步，揚起的塵土也足以把專制埋入地獄！我們們呼籲同胞組成以廉潔的中國共產

---

<sup>9</sup> 香港時報，1989 年 5 月 17 日，載於《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192 頁。

<sup>10</sup>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 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出版，1990 年，221 頁。

黨為主導，以中國工人階級為主體，以海外內的愛國人士為『中堅』力量的體系。<sup>11</sup>

5 月期間工自聯召開多次會議，討論國家生產力、增加出口收入、工人福利、人權、民主和自由等議題。在往後數星期，組織逐漸擴大，發展至擁有 100 名核心活躍份子和聲稱有 2000 名會員，後期更聲稱有 10,000 名會員。學生開始絕食後，工自聯向北高聯提供藥物、食物和水。他們更組織遊行支持學生。

隨著民運發展，更多工人參與其中。一位女工在六四鎮壓後在接受訪問時，回憶自己參與民運的故事。她去了幾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說後，受到啟發，於 5 月 16 日參與了遊行。問及她為什麼響應首都鋼鐵工人的號召加入遊行，她說因為他們是工人，因此「可以發出工人的心聲」。此後她經常參加遊行。5 月 19 日晚上，當她聽到政府實施戒嚴令後，她和朋友逗留在廣場，與群眾一起支持學生：「如果大家都不走，那人民力量更大，比只有學生更大，可以守住天安門廣場。」5 月 26 日，當她首次遇上正支援絕食學生的工自聯成員後，隨即加入。她之後負責在天安門廣場內廣播消息，直至民運在 6 月 4 日遭鎮壓為止。

---

<sup>11</sup> 同上，225 頁。

不單是北京的工人參與民運，上海、廣州、杭州、南京、西安和長沙等大城市，先後出現了工人階級參與其中的大型遊行。不同城市的工人自治聯合會相繼出現，他們都是自發組織，還未有打算將所有聯合會團結起來。據一位前工自聯成員舉例，廣州的民眾是從本地媒體、香港電台廣播和美國之音得知學生示威的消息，然後他們建立一個工人支援小組向北京學生提供支援，以及抵制宵禁措施。民眾因戒嚴令而變得愈加憤怒，促使他們自發地上街示威抗議。這也啟發他們成立工人自治聯合會。一位活躍份子憶述：

我們的目標就是為了工人的利益和國家，提倡民主和進行宣傳之類。還因為當時社會上沒有一些政治團體能與共產黨對話或提上意見，所以就想成立這個組織，一來反對獨裁，及在各方面能發表一下社會上的不同意見。

當時我想如果各地都成立這類的組織，到時，只要把各地的組織聯合一起，就可以成為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就可以打破獨裁、專政這樣的制度。<sup>12</sup>

5月19日北京工自聯正式宣佈成立，並要求政治局在24小時內接納學生的訴求，否則罷工一天。政治

---

<sup>12</sup> 同上，84-98頁。

局並沒有接納學生訴求，反之政府公佈戒嚴令並指揮軍隊和坦克入城。這激發北京進入瀕臨革命的狀態。往後好幾天有百萬人再次上街違抗戒嚴令，工自聯成立敢死隊並號召會員阻擋軍車和軍火進入北京。

中共和示威者之間的矛盾激化，使工人和工自聯迅速政治化。5月21日工自聯發表「工人宣言」：

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我們在民主運動中必須要體現中堅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工人階級領導，我們有權趕走一切專制者。工人最懂得在生產中知識和技術的作用，所以我們決不答應人民培養的學生受到摧殘。<sup>13</sup>

工人變得愈來愈激進，但學生對他們始終懷有戒心，認為工人的介入會損害學生運動的所謂純潔性。4月17日，當工自聯籌委會成立時，他們向佔據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請求一同留守廣場，但遭到拒絕，而且投以懷疑目光。5月19日，當工自聯威脅罷工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發表聲明，呼籲工人不要罷工。直至5月下旬，當政府暴力行動升級時，學生才容許工自聯在廣場內活動。學生因恐懼鎮壓才開始改變想法，開始和工自聯協調行動。然而，由於學生一

---

<sup>13</sup> 同上，212頁。

直不情願，所以這兩個社會群體始終無法組成堅穩的同盟。

在戒嚴令宣布後，工自聯討論過進行罷工，但內部也有反對意見。同時，有報道謂首都鋼鐵工人另組工人自治聯合會，準備在軍隊向學生開槍後發起罷工。但總的來說，雖然有過罷工的建議，可是從未實現。即使零星出現過罷工，也不是有計劃的。不過，很多工廠都停產，或者產量顯著下降，因為很多工人都出去遊行示威了，而留守工作崗位的工人也興致勃勃地討論時局。政府嘗試阻止工人去遊行，但成效不彰。接近 5 月下旬，北京市政府指示企業扣減遊行工人的工資，所以那段時間工人的遊行人數曾短暫下降。

由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請辭（但被黨所拒絕）起，以鄧小平和李鵬為首的中共強硬派，已經準備在 5 月下旬鎮壓民運。6 月 3 日，北京全總發表聲明，公開譴責工自聯是反革命組織，呼籲政府取締。同一日，工自聯呼籲首都工人第二天罷工，但此時軍隊已經開始入城，成千上萬的工人和學生以血肉之軀抵擋十萬解放軍開入北京。共產黨下令屠殺是因為害怕工人和學生團結起來，更害怕工人若進行總罷工，局勢就失去控制。

6 月 4 日的流血鎮壓結束了一切抗爭。在這之後，工人遭受比學生更嚴厲的打擊，學生被判監禁，但至少 27 名工人在 6 月期間被處決，其中 14 人是工自聯成員。然後共產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鏟除異己，這包括黨政機關幹部，也包括像全總那樣的「群眾組織」。

民運以失敗告終，主因是完全沒有人預計到政府這樣兇殘鎮壓他們。而且工人要到較晚才發覺組織起來的重要性，但為時已晚。八九民運是一場幼嫩的運動，學生也好，工人也好，都缺乏經驗。儘管如此，工人對社會和政治的訴求，還是令到中共感到威脅，因為來自工人的抗議，使自稱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共產黨政權，變得名不正言不順。而工人也逐漸意識到中共是自己的壓迫者而不是代表者。當時工人的主要主張，並非後來中共所聲稱的要進行「反革命動亂」，要復辟資本主義。相反，這場運動，至少就當時工自聯而言，是主張保護國有資產，同時驅逐官僚份子：

這個國家是由我們工人和一切腦力、體力勞動者的奮鬥和勞動締造的，我們是這個國家的理所當然的主人，國家的事情怎麼做，應當而且必須聽聽我們的聲音。絕不允許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專無產階級政！決不允許由少數的民族敗類、階級的敗類，盜用我們工人的名義鎮壓學生、扼殺民主、踐踏人權！…為了社會主義改革大業，為了我們的民主愛國運動，為了

我們的後代能在掃蕩了斯大林主義專制之後，…我們緊急呼籲海外僑胞、海外華人，立即支援中國人民的民主愛國運動…（《告海外同胞書》，5月26日）<sup>14</sup>

自1989年後，中國再沒有類似由工人發起的政治運動。個別工人自治聯合會成員（以及主要學生領袖）在逃離中國後，對社會主義幻滅而擁抱資本主義。然而，當中共為當時反抗的工人扣上反社會主義和反革命的帽子後，自己卻逐步走上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共融的道路，將中國變成一個巨大血汗工場，這是何等的諷刺！而這場殘暴鎮壓也成為往後鎮壓其他抗爭的「典範」。例如，2002年，在大慶油田工人示威期間，政府當局派出坦克車來威嚇工人屈服，叫人聯想到六四鎮壓。

往後20年中國工人處於更嚴峻的奴役狀態。打垮這次民主運動，讓中共可以加速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在世紀之交，不少地區都出現過國企工人反私有化抗爭，然而，由於無法組織起來，這些反抗無法扭轉大局。儘管如此，這些鬥爭也往往取得局部勝利，並非毫無意義。

---

<sup>14</sup> 《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1989年11月，十月評論，44頁。

## 反私有化的抗爭

中共對於大量工人支持學生的民主訴求，特別震驚。以前中共在贖買資本家的財產和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候，口頭上經常說依靠工人階級。但是，經過1989年的民主運動之後，中共當然更不會依靠工人了。此時，中共的社會基層更明顯地從依靠工人階級轉移到依靠企業家。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讓官員自己名正言順地致富。它決定將大量國企私有化，並且不惜對國企工人進行第二次打擊。

1992年，中共第14屆人大會議正式宣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國企私有化或商業化開了綠燈。1996年，中共再宣布「抓大放小」政策，結果不僅是許多小型國企被私有化，連許多中型甚至有時大型國企也遭遇同一命運，大規模解僱工人隨之而來（先下崗，過幾年再正式買斷工齡）。即使有大型國企仍屬國有，也大都成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所以亦出現大規模裁員。在不少情況中，國企經理都乘機把國有財產化公為私，或者刻意搞壞企業，或者兼而有之，總之結果都是令其倒閉，然後得以遣散工人，同時讓管理層把國企資產變成自己的私產。城鎮的集體企業基本上也是同一命運。

1996 至 2005 年間，超過六千萬國營及集體企業人被解僱，規模之大前所未見。2003 年，活躍的城鎮勞動人口已增至兩億，但其結構大大改變了。國企工人從 1995 年的一億一千二百萬減至 2003 年的六千九百萬；同一時期，城鎮集體企業工人的數字亦從三千五百五十萬跌至九百五十萬。另一方面，日漸興旺的私營企業卻取代國企，成為主要的創造就業的部門，吸引了一億二千萬貧苦農民離鄉別井，成為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工資極低，根本難以維持生計，而社會保障少之又少。這場「改革」，摧毀了有保障的就業，而重新創造就業機會都是很少保障的。這無疑是社會的大退步。從此中國工人階級分為兩個部分：舊工人階級在經過改制後，淪為少數；同時農民工成為了工人階級的多數。兩個部分都經受著工資及福利的下調壓力，不過，私營部門一般比國有部門惡劣。

「主人翁」和「領導階層」的榮譽早已蕩然無存。國有部門的工人無異於二等公民，農民工更位列其後。

面對巨大的社會退步，女工所受打擊尤其嚴重。早在 1987 年，當國營部門出現第一輪萎縮時，被辭退的工人中就有百分之六十四為女性。伴隨裁員的是猛烈的官方宣傳，鼓動女性回家，說家庭才是她們的崗位。社會精英聲稱生育令在職女性喪失生產力，所以不應受僱。這導致女性工人被僱主摒於門外，連年輕

女性，或剛畢業的女大學生，都遭此待遇。即使有幸獲聘，女性的工資往往比男性的低得多。早在 1988 年，調查發現，城鄉女性的工資只有男性的百分之八十四；1990 年是百分之七十七點五；到了 2000 年更滑至七十點一。<sup>15</sup>在曾是工業重鎮、後因大規模改制而日漸蕭條的東北地區，失業女工有不少要從事性工作賺錢養家；由於競爭激烈，每次交易的報酬僅得 50 元人民幣。2002 年 10 月，二百名被福建省龍岩市鋼鐵廠解僱的女工手持「下崗太小，做雞太老！」橫額遊行。

從 1990 年代末起，工人掀起過一場反私有化抗議。1998 年，當時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曾說過，因為官府門口總是被抗議工人包圍，所以他到下面考察，大多走不了正門<sup>16</sup>。縱使抗議相當多，但更多國企工人沒有進行反抗。由於新聞檢查，無人知曉全國的真實情況。揭露出來的都只是零星事件。直到本世紀初，互聯網的應用變得普及，國企工人才有一個渠道公開他們的個案。

反對私有化的抗爭一般來得太遲。工人沒能在政策提出來的時候就提出反對，往往待到地方政府把私

---

<sup>15</sup> 《經濟轉軌中的中國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潘錦棠/中國人民大學，原載《管理世界》2002 年第 7 期

<sup>16</sup> 明報，1998 年 4 月 29 日。

有化政策落實到自己廠之後，才有點反抗，但為時已晚。這裡有多方面原因。無疑，1989年的失敗一時消滅了工人的政治想像和反抗精神，無法對國家的資本主義改革提出自己的抗衡立場。再者，過去的「社會主義父權主義國家」雖然為工人提供工作保障及福利，但由於同時壓抑政治自由，也令他們對黨國產生了消極依賴的情意結，一切坐等黨和政府的安排。即使他們察覺到私有化的噩耗降臨他們的工廠，他們的抗爭也只能限於工廠，很少上升到控訴國家的私有化政策。所以像2000年鄭州造紙廠的抗爭，是很少數的特例。此外，一般國企工人亦受到固有的青天思想影響，總認為這只是地方官而非中央政府的錯，只要中央介入，必有轉機。所以工人行動的第一步往往是上訪北京，儘管這對京城以外的工人而言是何等費時破財。其實中央早已放手地方鎮壓反抗私有化的國企工人，所以工人上訪北京通常無效而又費時。同時，由於擔心鎮壓，工人通常也把抗爭限於自己工廠。但即使這樣，也招來嚴厲鎮壓，而且用1989年的鎮壓來唬嚇工人。例如，鄭州造紙廠工人的反私有化抗爭（見下），在高潮時，公安向抗議工人吆喝：

1989年六四北京那麼大的事政府都鎮壓了！你們算甚麼！

然而，不去進行聯廠鬥爭，又使到抗爭難以擴大，結果還是失敗居多，最多是爭取到較好的買斷待遇而已。所以，2002年的遼陽鐵合金廠工人，不畏鎮壓，開始進行聯廠鬥爭，雖然失敗，卻難能可貴。

工人的反抗有時還發展為工人佔領工廠及進行自主管理。1998年的洛陽水泥廠及2004年重慶3403工廠兩個例證（見下）都是很好的例證。3403工廠工人更明確地質疑中央的整個政策背離社會主義原則，表現出少有的政治意識。

下面列出幾個反私有化鬥爭的典型案列。

## 把官方工會改造為工人工會： 2000年鄭州造紙廠工人的抗爭

2000年鄭州造紙廠工人的抗爭是很少數成功反抗私有化的案列。工人更成功將官方工會改造為工人工會，同時也把職工代表大會置於工人權力之下。

中華全國總工會從未反對私有化。恰恰相反，它協助各級黨書記私有化，或索性袖手旁觀。至於職工代表大會，也跟中華全國總工會差不了多少。但在企業範圍，如果工人能夠強力反抗並有效組織，或許能夠像鄭州造紙廠工人那樣改造官方工會和職工代表大

會。成功當然不易，但不表示沒有可能。最終結果取決於有關企業內的力量對比，而工人的潛力大小又決定於企業的具體歷史及工人過往傳統。

鄭州造紙廠在 2000 年時有大約 2000 名工人。直至 1988 年，工廠業務一直蒸蒸日上，然後舊任經理被解僱，並由腐敗的官員補上。自此，新經理不斷把工廠資產化公為私，導致工廠面臨赤字。1995 年 4 月，市政府指工廠污染，勒令停產，工人被逼下崗。雖然下崗表示工人還同工廠保持僱傭關係，卻沒有收到工資。1996 年 7 月，新經理陳文魁因為工人反抗而未能出售工廠的倉庫。但不久，他卻成功將工廠售予豐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10 月，豐華與市政府商議後，向工人保證會對工廠重新注資及恢復生產，並於僱傭合約期滿時向工人發放所欠薪金。同年 11 月，工廠的職工代表大會開會通過收購計劃。1998 年 8 月，市政府同意豐華接手價值一億人民幣的工廠資產，並讓陳文魁擔任豐華的總經理。從 1998 年末至 1999 年末，陳文魁擅自秘密地將工廠地皮抵押予銀行，又以低價將數以百萬人民幣的工廠資產出售。1999 年八月，陳文魁透露將工廠重建為住宅區。此時，工人方知受騙，立即通過工廠工會，展開調查，及向政府機關反映意見超過 200 次，要求政府介入取消計劃。10 月，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支持計劃，聲言「國家政策不可推翻。」10 月底，陳文魁召開職工代表大

會，企圖操控大會通過其計劃，但代表以五十票對五票通過立即停止計劃。十日後，全體工人回到工廠，驅逐豐華的管理層。但不久，陳文魁的管理層捲土重來。11 月 2 日，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人代表又發現豐華打算出售整片工廠地皮。工人迅速行動，以職工代表大會的名義向土地局取回工廠的土地證。2000 年 6 月 7 日，2000 名工人重回工廠，又一次趕走管理層，重掌工廠及恢復生產。他們自組新的領導層，包括副總工程師李家慶及得到很多工人擁護的退休女工劉玉蕊。她跟工人說，今天工人階級的狀況，跟蘇聯解體是一樣的，由原來的主人變成弱勢群體，而這一切都是腐敗，資本家和官僚造成的。

同時，政府亦部署還擊。8 月 7 日，李家慶被捕。翌日早上政府的專責小組動用 500 警察包圍及闖入造紙廠，當時廠內只有 40 名工人。工人反抗，但被制服及毆打，其中一名工人更被拘捕。

工廠繼而被警方佔據，專責小組則召開職工代表大會，逼使工人代表簽署支持賣地，但不成功。市政府終於決定放棄。工人重奪工廠，並於 9 月 16 日組成新的企業工會，由劉玉蕊為主席。2001 年 9 月，市政府最終向工人讓步，正式取消賣地計劃，並將管理權交還工會。翌年 1 月 9 日，九名工人代表正式接管造紙廠，同時要求市政府把工廠重新轉為國營。市政府

斷然拒絕，成功遊說工人另組公司。2002年，新公司於職工代表大會上成立。是次事件在當地造成相當大的影響。隨後幾年，鄭州多間國企在工人壓力下相繼取消私有化。

另一方面，市政府卻拒絕釋放兩名被捕工人。公安繼續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起訴二人。2000年2月13日，法院開審。當日法院門外聚集了眾多工人。當李家慶出現時，工人拿起「李家慶萬歲」橫額來聲援他。他身體不佳，但依然志氣高昂。他在牢獄中寫了一封致劉玉蕊的信，字裡行間盡見他對工廠的深情：

好久未見，十分想念。聽說你當家了，職工們的血汗財產也快回家了，祝賀你。聽說全廠職工為之而紛紛動淚。我在此高牆之內，也是同情。

我們的家，真是多災多難，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那財產是用幾百上千人的四十餘年的青春年華、汗水與鮮血創造與積累的。現在不是仍有兩職工苟延殘生、生不如死嗎？還有王桂伍、吳忠義、王建新老婆等五、六位亡靈呢？這些亡靈在陰間看著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不能守好財產，丟了財產，真是死不瞑目。

至於我，從廣州來到鄭州紙廠，亦已三十年，把最寶貴的青春年華貢獻給了它。在最後的生命歲月

裡，能為紙廠財產安全做點事，做最後的一次貢獻，也理所當然地值得。我已做好（準備），豎著進入看守所，橫著離開某個監獄。當一個人將生命置之度外，便沒有什麼邪惡能戰勝他。

望你能依職代會的原則，團結群眾。那財產今天能回來，你是有偉大的貢獻的，還有耿愛榮，如果你倆當年不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把土地證揣在懷中堅持了半年之久，財產早已被豺狼們吃完了，其中你倆頂著天塌地陷的壓力。我衷心地感謝你們。

此後，我已預言，那些當年的兼併詐騙利益既得者，必定要陰謀輸了紙廠，贏回官司，一定會不惜血本，硬訴硬判，置於死地，報此一箭之仇而後快，以借此打掉紙廠無產階級的威風，奪回一根稻草。

如果非要把我逼上應戰的絕路，後退是沒有出路的，唯有迎接戰鬥，昂首向前。」（有刪節）<sup>17</sup>

最後李家慶被免起訴，無罪釋放。

---

<sup>17</sup> 此信載於大陸一份電子報《隧道》，2001年3月17日。《隧道》以電郵傳遞。關於鄭州造紙廠工人的抗爭的報導，當年網上有不少，但最近多已被刪。《毛澤東天地網》仍有一篇：  
<http://www.maostudy.org/2000-10/henan1.txt>



## 跨廠聯合：遼陽鐵合金廠工人抗爭<sup>18</sup>

這是第一宗有報導的跨廠聯合抗爭。跨廠聯合甚為罕見，因為風險很大；中共對任何形式的工人跨廠聯合都恨之入骨。2002年3月11日，來自遼陽市六家工廠的工人聯合遊行抗議私有化。六家工廠分別是：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儀錶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這六家工廠都是瀕臨破產和已破產的國企。由於企業領導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資，而逼使這些工人走上街頭。

一位鐵合金廠的60多歲老工人、老黨員說：「我的退休金是200多，我老伴兒拿300多塊。幹了40年吶！全家就靠我們老兩口支持著，我又得了結核病。孫子的學費、午飯錢也是勉勉強強湊的。我半年多不交黨費了（另一老黨員的愛人插話說：我愛人還交著呢，交給街道辦事處），愛開除開除吧」。自然，也沒什麼組織生活了，「工人黨員早沒人管了，下了崗就沒人管了」。<sup>19</sup>

---

<sup>18</sup> 這個案例的資料或者來自網絡，或者來自個人訪問。

<sup>19</sup> 《來自遼陽報告》，陳泰，  
<http://www.xinmiao.com.hk/0000/6405T.htm>

遼陽鐵合金廠（簡稱遼鐵）是這次長達兩年的抗爭的主體。遼鐵有八千三百名工人，直至1998年一直正常營運。工人相信，是管理層刻意把工廠弄垮，然後在破產時化公為私。2000年他們上訪北京，但一無所獲。2001年11月，工廠正式宣布破產，工人很憤怒，經過幾個月醞釀，在2002年3月示威抗議。3月11日早上，五千名工人手持毛澤東畫像上街示威，要求支取工資及對工廠倒閉進行調查。接下來在第二、三日的示威，參加者人數已增至逾萬，主要因為另外六所與遼陽鐵合金廠有相同遭遇的工廠，都有工人跑來支持示威。

這次工人鬥爭的組織性以及長期抗爭的堅韌性令人注目：

到北京上訪需要籌集路費等資金，均由工人自發捐款。工人能夠組織起來的原因是鐵合金廠侵犯了工人的利益，在此基礎上，經過工人積極分子反覆到工人區中宣講反腐敗、拖欠工資的事情，工人就自願組織起來了。2000年初傳出了要破產的消息，代表們開春就開始鬥爭動員：在社區貼通知，宣講破產給工人們帶來的壞處，一講一個多小時。為了取得全體工人的認可，2000年5月上訪時正式開始按居住社區民主選舉代表，這次選舉在遼鐵廠的俱樂部舉行，之前各社區張貼通知，號召大家都去選舉，能坐900人的俱

樂部去了不少的人。7 個社區，每個社區選了 2 個代表。2000 年上訪的核心代表為 32 個，2001 年到北京時去了 10 個代表。

同在一個工廠，同是工友，職工代表們之間見面認識，但共同進行這樣的反腐維權行動，他們還是第一次。相互之間瞭解不深，在現實上存在警察恐怖和分化瓦解的情況下，代表們要達到完全的信任和步調一致需要一個過程，所以這次行動配合得並不怎麼默契。隨著鬥爭的繼續，後來就在群眾工作中逐漸熟悉起來了。每次開代表會前，老的職工代表要到群眾中瞭解新的職工代表的情況，以防警察通過收買派進奸細。職工代表有明的有暗的，每個社區有兩個明的；暗的在做一些台面後的工作，比如印製傳單一類的，印好了交給明的代表拿去貼。暗的代表另一個作用是新鮮血液，隨時填補明的代表的空位，因為明的也有損失掉或變色的時候。暗的代表平時不出頭，有事一起商量，明的代表不起作用了，暗的再上。每次與市政府交涉、上訪前，代表們都要把請願或談判打算提出的要求印成傳單貼在社區，徵求群眾意見。如果群眾認為不該去，就不去；對要求有意見，各社區代表就湊在一起研究修改，代表最多時有 100 多人。經過幾年的鬥爭，職工代表隊伍受到了鍛煉和純潔。儘管有個別工人代表被分化收買，接受了人家的小恩小惠，使工人的鬥爭出現暫時的挫折，但這是任何鬥爭

的團隊都會出現的現象，並沒有影響工人的整體團結。<sup>20</sup>

這場工人聯合行動震驚了官方，因此決定鎮壓。2002 年的 3 月 17 至 20 日之間，政府拘捕工人代表姚福信和蕭雲良。一年以後，他們被判「顛覆國家罪」和入獄四至七年。

雖然工潮以失敗告終，但工人並非一無所得：

遼陽鐵合金廠職工通過鬥爭也為自身贏得了一些利益。工人運動高潮後，遼陽市政府為了安撫工人，遼陽市政府開始積極補發鐵合金廠的拖欠工資，到 2002 年 5 月 4 日償還拖欠工資的 50%、2003 年 6 月償還了全部拖欠工資，2002 年將醫療費全部報銷，有的老職工 7、8 萬的醫療費多年不給報銷，這一次全部解決。到目前，拖欠工資一分不少補齊，此外向工人支付住房資金、兒童保健、醫療費、勞動保險、取暖費等多項費用共計二千萬左右，目前只遺留了青年職工的失業金問題。工潮造成的巨大壓力迫使腐敗勢力動用當地政府的一切資源平息事件，政府的官員們變得格外積極了，挨家挨戶到遼鐵職工家中問寒問暖，什麼問題都幫忙解決，哪家下水管道堵了或者燈泡壞

---

<sup>20</sup> 《遼陽鐵合金廠的改制過程和工人的反腐維權鬥爭》，燎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410/613.html>

了，馬上保質保量免費修好。當時只要工人不問及工廠破產、官員腐敗等原則問題，只要是錢能夠解決的就盡力解決，迫使政府像吐血一樣傷筋動骨，為的只僅僅是保全遼陽的腐敗勢力。

如果不是把抗爭逐步升級，工人連上面的收穫也不會輕易取得。正如一名工人總結道：「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

過後一些工人反思：

在工廠開始私有化的時候，沒有及時組織堅決的反腐護廠行動是個錯誤。等到工廠被蠶食掏空，被宣佈改制破產以後，以為真正抓到了腐敗分子的證據的時候才開始組織堅決的行動，已經為時晚矣。工廠財產已經被轉移，腐敗分子已經編織好了保護網甚至異地做官經商；在群眾眼見鬥爭不會得到多少果實，只能討要一點欠債的時候，鬥爭的動力就減弱了。這時候，單純的憤怒造成的運動儘管悲壯，卻並沒有改變工人運動的被動局面。<sup>21</sup>

---

<sup>21</sup> 同上。

## 獨立組織：大慶油田抗爭<sup>22</sup>

2002年大慶油田工人抗爭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的規模及持久，還在於它打出獨立組織的旗號。大慶油田是中國最大的油田，位於黑龍江省內，是中國石化改制後的分支。直至1990年中葉，該油田是中國在石油上能夠自給自足的原因之一。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到2007年時已基本上開放了所有重要的經濟行業，包括石油。所以北京開始對石油業進行改制重組，以求可以與國外石油巨頭競爭。這導致六十萬工人在短短幾年間被解僱。

2002年1月3日，三千名石油工人於大慶油田管理局外抗議，並一度闖入管理局。接下來，每天都有行動而且繼續升溫，最鼎盛的時期有多達五萬工人參與公開抗議。3月4日，抗爭到達高潮之時，兩萬名工人於鐵人廣場聚集後遊行至火車站，阻塞火車往還。在鐵人廣場的行動維持超過四週，期間都有一個自稱「大慶石油管理局買斷工齡職工臨時工會委員會」的工人組織，在廣場多處張貼標語和呼籲書，還流傳傳單。不過這個組織的代表一直沒有露面，也沒有站出來與局方談判。2002年3月18日這個委員會提出：

---

<sup>22</sup> 這個案例的資料或者來自網絡，或者來自個人訪問。

1. 強烈要求取消買斷政策。
2. 參照市政辦法，給年齡較大的買斷職工和幹部提前辦理退休手續。
3. 35 歲以下買斷職工和殘疾人返崗上班。
4. 對單職工的家屬在房改等方面增加補助費、生活費。
5. 採取慎重態度解決待業青年就業問題，特別是年齡較大的待業青年就業問題。

3 月 20 日又提出：

1. 還我代表上訪合法權利，不准監控。
2. 強烈要求同買斷職工代表正當對話。
3. 必需保護代表正當對話的權利、責任、義務和安全。
4. 代表對話時的意見和要求必需傳達到買斷全體同胞。

5. 不按要求出現後果，全部由大慶石油管理局、大慶油田責任有限公司主要領導負責。<sup>23</sup>

面對工人抗議，國務院立即組成調查組，在 3 月 25 日抵達大慶，為當地管理局撐腰。同時，省工會亦宣布工人所組織的自治工會屬非法組織，因為所有基層工會必須由上級組織。大慶石油管理局工會負責人則說，工人從買斷工齡開始就已經不是工人了，根本不能組織工會。

3 月 26 日，工人以傳單回應官方：

2000 年 11 月 8 號下發了慶局發（2000）117 號文件《關於印發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的實施辦法的通知》。這應該說是關係到數萬名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舉措，也可以說是企業改革的重大決策。按照企業法的規定，企業的重大決策或重大事項必需得到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決定。那麼這項決定是由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嗎？哪個職工代表知道呢？不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決定，單憑一個通知就執行是不是違反了《企業法》、《工會法》？局工會為什麼不出面維護職工利益？看來局方所強調的「合法性」是站不住腳的。

---

<sup>23</sup> 《來自大慶的報告》，林瑾，  
<http://www.xinmiao.com.hk/0000/6304T.htm>

大慶市石油管理局是我國五百強企之首，這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五百強企之首的石油管理局連幾萬職工的生存權也保證不了，局長、書記的臉面有何光彩？大談減員增效，減了員才增效，說明你們無能！不減員也增效，才能證明你們有本事，有水平，也會得到幾萬職工的擁護。上級給了你們高幹的位置才不是白給了。不然 200 多平米高級住宅住著，幾百、幾千元高檔飯吃著，幾十萬的豪華車坐著，百萬獎金拿著，你們心裏坦然麼？想過數萬買斷職工多年以後的生活、生存問題了嗎？

大慶買斷工人的抗爭，如果要成功，取決於他們能否獲得在職工人的支持。但是，在職工人即使對被裁同工深表同情，卻因為擔心被解僱而不敢支持。而這裡又關乎大慶的特點：大慶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大部分工作都跟石油業有關，一家人全是中國石化的工人很普遍。如果一家人已經有人下崗，而在職的家人又去抗議，那麼一旦被報復，就可能全家陷入困境。所以許多家庭都是讓買斷的成員上街示威，但在職的就保持沉默，只有這樣的分工，才能保住全家。但由於買斷工人不會積極動員仍然在職的工人，同時也限制了抗爭的擴大。而單靠買斷工人天天示威難以湊效，因為工人一旦失去工作，就沒有了最有效鬥爭工具，即佔據工廠罷工。下崗工人長期的街頭抗議逐漸變得難以支撐。所以到了 3 月底，抗議的規模明顯縮

小。2002 年 4 月 19 日，當局清場，派出大量警察拘捕工人，以十二輛公車把餘下的工人抓走，直至他們的單位把人領回為止。22 日，鐵人廣場宣布戒嚴，工人的鬥爭終於被鎮壓。

## 社會主義思想不死： 2004 年重慶 3403 工廠工人抗爭

關於重慶 3403 廠工潮的網絡報導，大多來自工人自身。他們在面臨國家機器鎮壓、孤助無援的情況下，將一連串《系列報導》發佈到網上，訴諸媒體輿論。工人在抗爭的同時，做了大量的搜集證據、調查分析，不僅詳盡記述了官商的發跡史，而且表現出寬廣的社會視野。他們不只限於為自己喊冤，還提出「民主經營，生產自救」的要求。在「郎咸平風波」所引發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論爭中，3403 廠工人也以自己的廠改制歷程為證，痛斥官方新自由主義精英為「資產階級的乏走狗」。在《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公開信》中吶喊：「我們要活命，不能活命時就只有拼命！」，「國企虧損以至破產的根本原因在於廠長的惡意經營」，「我們普通老百姓不懂得什麼高深理論，但我們懂得『共產』就是『共同擁有財產』」，並預言「國企私有化終將激發革命」<sup>24</sup>。

---

<sup>24</sup> 工人當時的貼文現在大多已經被刪，但在各網絡時有轉載，見 <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topic-t348.html>

這次工潮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但工潮所傳達出來的階級意識和政治深度標誌著工人鬥爭達到新的水平：對「國企改制」真相的深刻認識與揭露；號召「工人不打工」；雖然不得不呼籲中央的干涉，但是已經清楚認識到自己的困境正是中央所造成的。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報道中沒有直接談到，但仍可從中看出工潮有著嚴密的組織性，有許多活躍、幹練、前仆後繼的組織者，而普通群眾則自覺、勇敢地保護這些積極份子的安全。

3403 廠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 3403 工廠，是成都軍區後勤部管轄下的工廠。該廠因廠長張成義（工人出於厭惡，在發佈消息時不提其名，稱之為張二毛）「惡意經營，只管自己撈錢，不管職工死活，使工廠瀕於破產邊緣」。惡意經營之其中一例，就是在 2002 年 8 月與重慶耐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耐德）總裁林朝陽合謀成立耐德山花公司，生產特種車輛。耐德出資 200 萬元，3403 廠出場地設備等。林朝陽另以耐德公司名義開設了耐德宏陽摩配分公司，無償佔用 3403 廠區內的部分廠房，生產摩托車缸頭。將近兩年後，即 2004 年 6 月，3403 廠終於陷入破產境地。

但破產是瞞住職工秘密進行的，沒有任何公告，或競價拍賣。價值近 2 億元的資產被重慶市計經委的

官僚評估成僅僅 2200 萬元，賣給了耐德公司（據說只到帳 200 萬）。

耐德公司前身為創建於 1958 年的軍工企業重慶儀錶廠，是國家定點生產流量儀錶的重點骨幹企業。成都軍區後勤部從 86 年起就派有軍代表駐在重慶儀錶廠。長駐耐德的軍代表有 6 人。這些軍區首長和駐廠軍代表早就為耐德公司林朝陽所收買。主持賤賣的正是成都軍區某主管官員王旭（大校軍銜），後來表面上還曾被「雙規」過。工潮發生的第二天，就有軍區某大人物到場，給林朝陽出了主意後匆匆離去。

在《系列報導》中，工人主要揭露的就是耐德公司林朝陽及其胞弟的發家史。據報導，林朝陽與市政府上下串通，營私舞弊，壓制和刁難工人和正直的幹部：

他們惡意經營的方式有以下幾種：

1. 低價賣出，高價買進，從中獲取貓膩。
2. 把工廠的資金開設多個私營公司，一點點蠶食國有資產。

3. 用工廠的資金為自己兄弟親友開企業，高價購進其劣質產品。
4. 年終秘密私分工人血汗掙得的勞動成果。廠級幹部一次就是上百萬元，中級幹部少則十幾萬元，多則幾十萬元，70%回扣給廠長。年終給廠幹，中幹的家屬發辛苦費均在 3000 元以上，子女發上千元的壓歲錢，並免費集體旅遊。而職工的全年只有一次年終獎，最多不超過 200 元。

2004 年 8 月，工人得悉工廠倒閉後迅速行動。8 月 18 日，工人封鎖了工廠，禁止山花廠的物資及人員進入，要求政府解釋並取消這一非法交易，依法懲處廠長。同時提出：「我們 3000 職工願意每人集資一萬元，以高於耐德 2200 萬元的價格購買自己的工廠，自己進行民主經營，生產自救！」

8 月 20 日下午，張夥同保安公司，出動 50 名保安人員，林朝陽的胞弟林雪松則糾集社會上的地痞、流氓十多人暗藏兇器，驅車到 3403 廠，與護廠職工發生小規模衝突。

21 日，星期六，本來是法定休息日。林朝陽強令耐德公司的男職工乘幾輛租來的大客車，繼續衝擊 3403 廠，並阻斷該廠大門外的國道（誰若不去就以曠

工論處）。3403 廠護職工人對耐德工人高呼：「工人兄弟們，不要受張、林利用，工人不打工。」部分耐德工人當即離開現場。張林挑動工人互鬥的陰謀暫未得懲。

情勢相當緊急。幾千職工已聯名上書中紀委書記吳官正，以及中央台的焦點訪談等（沒有回音），並且迅速把消息發佈網上，他們緊急呼籲：

流血傷亡迫在眉睫，我們呼籲全中國全國世界的正義者關注重慶市，譴責非法非正義的重慶市經委的貪官，我們強烈要求共產黨政府高層立即出面調查，查清黑箱真相，還天下人公理和正義。

8 月 25 日，300 多名警察闖入工廠，稱耐德收購 3403 廠是合法的，工潮則是非法的，要工人停止「鬧事」，恢復生產。

警方除了「同意職工看病報賬的號數增加到 400 個，退休工人醫藥費每人每年增加到 1200 元」之外，對工人質問的所有問題都含糊其詞，或無言以對。

同時工人已經感到決戰一刻快來了：

重慶市已在黑手們的控制之下，要以非常的法制程式來解決此事，無疑比登天還難。...前幾年重慶礦山機械廠、西園機械廠等，他們破產的原因與我們很相似，工人也組織過工潮，但他們的工潮行動被重慶市公安局殘酷的鎮壓了。幾年後的今天，歷史的悲劇又要重演了，你說我們能與強大的市政府、公安局抗衡嗎？

決定性的一晚終於來到。8月30日，是3403廠工潮開始的第13天。凌晨3點半，重慶市政府調集了全副武裝的防爆警察400多名，800多名持有警棍的著裝警察，50多名保安，數量未知的便衣警察，從各區調來的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以及被強迫驅使來的200名耐德普通職工，聯同耐德公司的所有大小頭目，分乘12輛大客車及貨車，在清晨5點多鐘強行進入了3403廠。進入了夢鄉的3403廠職工還不知道厄運已經降臨。警察、保安封鎖了護廠工人進出的所有通道，工人家屬區每個單元的出口，秘密搜捕工潮組織者。任何人都不許進出。有人出來即亂棒打回。一個40多歲的工人，奮不顧身沖了出去。警察立即撲上，把他按倒，接著5名警察對他暴打，打累了又換5個人上去繼續毆打，然後又拖到一間屋裏毒打，一聲聲撕裂膽淒慘的叫聲回蕩在3403廠土地的上空。

這叫聲撕裂著每個工人的心，沒有一個不淚流滿面，痛哭失聲。慘無人道的警察還把其70多歲的老母親拉出來，當著她的面打她的兒子。我們的同志被打得遍體淋傷、血肉模糊，最後被警車帶走，至今生死未卜。3403廠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每個人幾乎快要窒息了。

3403廠工人的抗爭，顯露出少見的政治眼光。很多國企工人的抗爭都反對自己工廠的私有化，但是很少直接針對中央的「產權改革」政策，因為反對中央政策是禁忌。但3403工廠工人卻敢於犯險。從2004年9月至12月，他們上載了多篇文章，言論大膽反對私有化。他們批評共產黨在毛主席死後，推翻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把工人變成被剝削的階級。在《國企私有化將造成一場革命》文中，工人寫道：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同樣莊嚴規定著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今天，在執政黨還叫做『共產黨』的中國，居然公行這種私有化侵吞國資、把職工推向失業，危及生存的非法定行徑，這是為什麼？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惡果就是『掠奪優先，不顧公平』，不但沒有根本解決廣大人民的吃飯問題，私有化產權改革更使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陷入朝不保夕，下崗失業衣食無著的悲慘



境地。GDP 號稱年年穩步增長，可失業越來越多，老百姓生活越來越苦，權勢富豪卻越來越富有。

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私化惡浪，造成了一個無本起家的新資本家階級，造成了像我們一樣的上億的新無產者，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但是現在宣傳的卻是什麼『一切利潤、產權歸企業家』，『對（掠奪侵吞國資）企業家的原罪要赦免，既往不咎』，以及什麼（私有化）產權改革有利於經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經營者應該持大股獨吞國資才有積極性，等等，等等。

看到這些，對國有和集體企業被大量私化，我們似乎有些明白了。但是，針對這些歪理邪說，除了那掠奪國有和集體資產的強盜及其走狗，任何人都會發出疑問：

既然『一切產權利潤歸企業家』，1949 年以前的中國早就是如此了，何需共產黨以千百萬人的生命犧牲來進行革命？

由於工人處境惡劣，鬥爭孤立在一個已停止運轉的工廠裏，沒能得到其他工人的支援，在國家機器的鎮壓下，勝利機會的確很小。但我們應當記住工人提著鐵棍和啤酒瓶浴血抗爭的經歷，和他們勇敢的呼聲：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 3403 廠正義的職工決不會被強盜的淫威所嚇倒，也決不在劊子手的屠刀下跪著生，我們要以遊擊戰的戰術打一場長期的持久戰。

## 國企工人瘦身，潛力依然強大

大慶油田有那麼多工人在一個重要產業鬥爭經月，而結果失敗，似乎代表了這場反私有化抗爭，在一黨專政下要成功實在很不容易。但是，在藍領國企工人暫時失敗的時候，又開始有白領階層加入反私有化抗爭。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條件，中國要在 2007 年全面開放銀行業。為了迎接競爭，從 2000 年開始，中國國營銀行相繼裁員。幾年間，中國工商銀行的員工人數從四十萬銳減至十一萬，中國建設銀行則裁減了十五萬員工。被裁員工開始互相聯繫去北京抗議。這些白領一向被視為待遇不錯，立場溫和，比較看不起普通國企工人。但是現在他們也被迫加入失業大軍。走投無路之下，這些白領也像藍領一樣加入抗議。可惜他們同藍領一樣，無法挽回他們的工作。

面對著一個黨國一體的政治制度，特別是經過 1989 年的失敗之後，工人的反私有化鬥爭是失敗了，

儘管要強調，如果不是有過鬥爭，工人連一些起碼的補償都可能沒有。

2004 至 2008 年間，國企工人進一步從六千四百四十萬減至六千一百三十萬，集體企業工人數字亦由八百五十萬降至六百二十萬。雖然國企工人數字銳減，士氣低落，但國企私有化的浪潮也接近尾聲。餘下的國企，大多也變成國有控股公司，數量雖不多，但由於規模很大，政府甚為重視，所以仍由國家控股。雖然現存的國企工人只有從前一半，但他們仍然佔據中國大部分重要工業，所以他們作為最主要生產階級的地位不變。第二，雖然比不上第一代國企工人，新一代的國企工人還是比較民工具有較明顯的階級身份認同。同時，工人社區網絡（這是民工所缺乏的）也給予他們多一點感情支持。另一方面，工人對 1989 年鎮壓的恐懼感現在已經有所減退，而過去十幾年又多少累積了抗爭經驗，所有這些因素都對工人恢復鬥爭士氣有積極影響。而國企工人越敢走前一步，他們站起來捍衛權利的決心就更大。2009 年吉林市的通化鋼鐵廠抗爭可以說明這點。

國有的通化鋼鐵股份公司（以下簡稱通鋼）隸屬於省政府的通化鋼鐵集團。2008 年 7 月，通鋼工人一致反對讓河北省一所私營鋼鐵公司建龍集團接手的建議，這已是該集團第二次嘗試收購通鋼。

建龍以超低成交價收購通鋼，然後縮減人手。2006 年，它因為某些原因退出通鋼，但這時通鋼反而獲利。2008 年，建龍想再次染指通鋼，但工人汲取上次收購的教訓，大力反對第二次收購。在工人抗爭最激烈時，曾封鎖工廠，脅持及毆打二十名高層經理才放他們離去。但此時通鋼經理陳國君惡言威脅工人要解僱他們。在怒火中燒之下，工人將陳國君打死。全廠工人也都全面動員準備最後鬥爭。市政府立即退讓，放棄收購計劃。這場工人運動的勝利，也鼓舞了河南省濮陽市的林州鋼鐵有限公司（簡稱林鋼）的工人的鬥爭。2009 年 3 月，三千林鋼工人一度於工廠挾持政府官員達四日，並成功迫使市政府取消私有化。

## 農民工的反抗

在政府打爛了超過六千萬個國企工人飯碗的同時，它亦促成私營部門大量發展並創造了新的職位，數量之多是國企所流失職位的兩倍。在一黨專政下，中國工資變得非常低，而紀律卻非常高，工廠簡直是軍營，因此中國能夠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天堂和世界血汗工廠。

自九十年代初以來，農村由於稅費太重，已經瀕臨破產，超過一億二千萬的農民不得不離鄉別井，到

城市找工作。在舊的國企工人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工人階級，大部分是女性。由於大多數人認為，民工的教育及技術程度都比城市工人低，所以他們的市場價值亦較低。結果是對民工的剝削也特別殘酷。

中國政府於 1995 年實施首部勞動法來保障工人，特別是民工。但這法例鮮有實行。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的勞動部對工人投訴充耳不聞，甚至打壓工人以阻止他們爭取權利。這大大有利跨國企業及其外判公司繼續無良地剝削工人。在出口加工區，工人一般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從早上八時一直工作至晚上十時亦不足為奇，有時甚至到凌晨二時。許多工人每月只有一日假期，有些甚至沒有。這完全超出了法定最高工時。工人實在難以忍受，但拒絕超時工作又會被解僱。

儘管政府與廠商聯合打壓，民工的反抗還是繼長增高。官方從不公佈罷工數字。據報，在 2004 年珠三角地區，就有超過三十次大型罷工，每次超過一千名工人。少於一千名工人的罷工一定更多。根據我們的訪談，沒有報導的罷工相當多。一名廣州工人就告訴我們：「在我們工廠，罷工非常有用。要是逾期不發工資，或者管理不合理，我們一罷工就擺平了。」

過去，國家的壓制及資本家軍營式的工廠管理，非常有效地壓抑住工人的反抗。但今天，這些做法日益反而變成招來反抗的催化劑。在 GP 超霸電池的反抗中，惠州市政府和老闆合謀打擊和欺騙工人，反而引致工人大罷工和上訪北京。2008 年東莞馬士基集裝箱有限公司的工人發生兩次暴力罷工，抗議公司軍訓式管理。東莞馬士基的「員工守則」中列明七十三條罰則，禁止工人派傳單、抗議及罷工，否則即時解僱。其他條例還包括：

第 18 條：違反餐廳管理規定，破壞餐廳公共設施和就餐秩序的，包括但不限於：破壞台凳用餐器皿，不按要求排隊就餐、用餐後將餐盤放在桌子上或未將餐盤放回指定位置的，或不將餐後剩餘食物、垃圾、餐具等送到指定位置或將餐後食物、湯水、果皮、飲料等倒在餐桌和地面上。第一、二次記過；第三次開除。

在地方政府的協助下，罷工被打壓，但是事後工廠也被迫改善勞動待遇。

越來越多民工明白，要改善自己的工作待遇，唯一方法就是反抗，而當中也有少數人明白，自發罷工作用有限，需要組織才行。2004 至 2005 年的友利電子有限公司（Uniden）事件就是特例。工人前後罷工五次，而且倡議組織工會，並因此被官商共謀打壓下去。

## 結語

另一個妨礙農民進行持久抗爭的原因是戶口制度。雖然民工還沒經歷過國企工人的重大打擊，但也沒有作為一個階級，一個命運共同體的集體回憶。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聚集在城市後，他們也不容易發展階級意識。農民工之所以有這個稱謂，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以農維生，事實上年青一代民工已經很少務農了。這個強加給他們的稱號，是因為戶口制度，因為在它下面，農民身份是世襲的，生為農民，則身份上永遠是農民。戶口制度猶如社會隔離制度，來防止民工享有城市的公民權。即使他們已經在城市打工 10 年甚至更多，也永遠無法享受城市公民權，因此無法獲得較有尊嚴的工作，也無法享受教育及醫療等公共服務，除非你花很多的錢。所以，他們無法在城市紮根。無論他們在城裡待多久，他們都知道這只是暫時的，所以難以培養出階級覺悟。

不過，時間漸長，戶口制度與要求人力自由流動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日漸明顯。事實上，近年戶口制度已經逐漸放寬。在年青世代，特別是那些有較高技術的民工，同老一輩民工已經不同。老一輩民工秉持的座右銘是「二十定出山，四十定收山」。但 1980 年後出生的新生代，這個觀念開始式微了，畢竟他們從沒真正耕過田，早已習慣城市的生活，因此更想在城市紮根。這多少會為民工逐漸發展出階級意識提供基礎。

三十年的急速經濟發展，都是建築在沉重的人文、社會及環境的代價之上。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工資佔國家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從 1998 年百分之五十三下降至 2005 年的四十一點四，與美國的百分之五十七形成對比。反過來，同期利潤佔的百分比卻大幅上升。大量的罷工、堵路及偶發的暴動就說明了，備受勞役的貧苦大眾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據報，1993 年中國就發生了八千七百零九宗「集體事件」（可理解為公眾抗議或罷工），在 1999 年升為三萬二千宗，2003 年六萬宗，2004 年七萬四千宗，2005 年八萬七千宗。短短十年間，增幅超過十倍。當中百分之三十五是農民抗議，百分之三十是工人抗議。官方媒體亦不得不承認，貧富之間的矛盾空前嚴重。2008 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更令中國的社會矛盾難以調解。但是，工人階級如果想有尊嚴的工作和生活，不僅需要反抗，而且需要組織起來，尤其需要國企工人與民工聯合起來。這些年來，兩個部分的工人所進行的自發抗爭，多少克服了後八九鎮壓的恐懼，而所爭得的局部勝利，也有助恢復工人的抗爭信心。如果這兩個部分聯手，那麼歷史新一頁就會翻開。

2010 年 6 月 4 日